

上海的鴛鴦與蝴蝶

上海本地並不生產鴛鴦或蝴蝶，即便是今天的上海不斷向外擴展，一直擴展到杭州灣。但是，在上個世紀的「五四」新文學運動前後之二十年，上海卻是現代文學史上眾說紛紛的「鴛鴦蝴蝶派」的大本營。不過，「鴛鴦蝴蝶派」中的「鴛鴦」跟「蝴蝶」，大多也不是本地產，多為外來。魯迅在《上海文藝之一瞥》中這樣說道：

上海過去的文藝，開始的是《申報》。要講《申報》，是必須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，但這些事我不知道。我所能記得的，是三十年以前，那時的《申報》，還是用中國竹紙的，單面印，而在那裡做文章的，則多是從別處跑來的「才子」。

這裡所謂的「別處」，也有「六十年前」與「三十年前」之分別。「六十年前」的「才子」，大抵因為「洪楊之亂」，無法在江浙一帶存身，也無法走「君子」「學而優」的道路，無奈之餘，落腳開埠二三十年的滬上。於是與上海週邊一些有些年數的鄉鎮裡的才子們一道，形成了近代上海文藝最主要的一道風景。對於這一時期的上海文藝，尤其是其主要的「色彩」，魯迅同樣有一段極為精彩的詩話：

才子原是多情多病，要開羅生氣的，見月傷心的。一到上海，又遇見了婊子。去嫖的時候，可以叫十個二十個的年輕姑娘聚集在一起，樣子很有些像《紅樓夢》，於是他就覺得自己好像是賈寶玉；自己是才子，那麼婊子當然是佳人，於是才子佳人的書就產生了。內容多半是，惟才子能憐這些風塵淪落的佳人，惟佳人能識坎坷不遇的才子，受盡千辛萬苦之後，終於成了佳偶，或者是都成了神仙。

這就是近代滬上最早的一批「鴛鴦」與「蝴蝶」。

而在這些「鴛鴦」「蝴蝶」一類書中，才子佳人之間的情愛故事，也就成了落魄滬上的才子們「苦悶」

前不久與做財經雜誌的朋友見面，大家互相感慨各自工作的困境，朋友嘆了口氣說：「現在每星期都要趕做一個專題，連看書也沒有時間。」工作生涯被壓縮成趕稿與交稿，其他所有的部分，如構思題目，資料搜集，在高濃縮的環境中，都成為奢侈的東西。香港傳媒的環境之惡劣，大概可以成爲一個研究專題了。有學者專門研究大陸民工的生活狀態，不知有無人研究香港媒體工作者的生存狀況？

曾與《城市畫報》編輯聊天，談到專題的選題，似乎是天南海北任何地方的話題都可，記者報上題目，揸著相機行李，外遊三兩星期亦可，一兩個月也尋常，聽到這種工作方式，不禁令人嚮往。對於香港的媒體人來說，那簡直是烏托邦了。最辛苦的是某些話題必須得趕。

七月份是香港書展的天下，短短一週的展期，媒體工作者卻在六月已經開始策劃，四處搜集資料。如果祇是報道現場情況還好，做上一兩期的專題亦相對容易了，最難的是屆時各地作家名人雲集會展中心，要有訪談，更得事先把不同作家名人的創作及新聞資料找齊。

訪問一個作家，尚可把對方的書盡量看了，要訪問好幾個的話，要做足這些準備工夫已是天方夜譚了，更多人索性什麼資料都不查，訪問前夕把對方最近的新聞看一下就提槍上馬。於是每年的書展都覺得特別累。如果有學者專門研究媒體工作者的生存狀態，或許會發現媒體工作者們，比起到城市裡打工的民工，不見得要好多少。

的象徵，或者是消閒的說道，其中多少也就有些所謂的「趣味」——才子們的趣味，不斷地向社會擴散滲透，慢慢地，就培養出來一種社會性的「趣味」——上海式的大都會裡的「才子佳人故事」。祇是這裡的才子，已不是傳統文本（像《西廂記》、《桃花扇》等）裡的「才子」，而所謂「佳人」，更全為「風塵」女子所取代，全然不見閨閣裡的「清規戒律」——就連民間傳說裡的祝英台式的「自我維護」的意願均已不見，大戶人家後花園裡牆頭月門邊的定情私語，更是爲十裡洋場現代的社交場所與社交方式所取代。鴛鴦蝴蝶們早已不滿足於在水一方的遊戲或田間林邊的翩翩起舞，而是要到海上滬上演繹屬於他們的時代浪漫了。

其實，文學史上的「鴛鴦蝴蝶派」的作品，並非全為「鴛鴦蝴蝶」所涵蓋。此外，還有涉及到社會、黑幕、媚門、哀情、言情、家庭、武俠、神怪、軍事、偵探、滑稽、歷史、宮闈、民間、反案等種種類別。不過，或許是「鴛鴦蝴蝶」最早也最能夠代表這一代的來源，同時在其中亦最有聲勢，於是便落了個如此名稱。

大都會與文學生產中心，從晚清一直到四十年代末，上海一度佔據了全中國文學的半壁江山甚至更多——沒有踏上過十六浦碼頭的全有全國影響的現代作家或許有，但數量斷不至於太多。

抗戰軍興之後，儘管已經淪落爲「孤島」，上海還能夠誕生出《金鎖記》等這樣新時代的新的「鴛鴦」「蝴蝶」。此亦可見所謂的「鴛鴦」與「蝴蝶」，並不僅限於一時。所不同的是，後來的「鴛鴦蝴蝶」，逐漸淪落爲坊間小報上低級的「噱頭」或地攤上極爲無聊的擺設——部晚清時期爲了響應傳教士們的呼籲而參加小說競賽的章回小說《除三書》，在「鴛鴦蝴蝶」的時代，竟然改頭換面爲《海上花魁影》和《花柳深情傳》出現在地攤上，此應可見上海市民階級的「文字趣味」，已經被怎樣地大大改變。

被追趕的文人

現在每星期都要趕做一個專題，連看書也沒有時間。」工作生涯被壓縮成趕稿與交稿，其他所有的部分，如構思題目，資料搜集，在高濃縮的環境中，都成為奢侈的東西。香港傳媒的環境之惡劣，大概可以成爲一個研究專題了。有學者專門研究大陸民工的生活狀態，不知有無人研究香港媒體工作者的生存狀況？

曾與《城市畫報》編輯聊天，談到專題的選題，似乎是天南海北任何地方的話題都可，記者報上題目，揸著相機行李，外遊三兩星期亦可，一兩個月也尋常，聽到這種工作方式，不禁令人嚮往。對於香港的媒體人來說，那簡直是烏托邦了。最辛苦的是某些話題必須得趕。

七月份是香港書展的天下，短短一週的展期，媒體工作者卻在六月已經開始策劃，四處搜集資料。如果祇是報道現場情況還好，做上一兩期的專題亦相對容易了，最難的是屆時各地作家名人雲集會展中心，要有訪談，更得事先把不同作家名人的創作及新聞資料找齊。

訪問一個作家，尚可把對方的書盡量看了，要訪問好幾個的話，要做足這些準備工夫已是天方夜譚了，更多人索性什麼資料都不查，訪問前夕把對方最近的新聞看一下就提槍上馬。於是每年的書展都覺得特別累。如果有學者專門研究媒體工作者的生存狀態，或許會發現媒體工作者們，比起到城市裡打工的民工，不見得要好多少。

海外廣播

我應該是廣播愛好者。從小時候算起，至少擁有過十多台收音機。即便是到了現在，互聯網、手機、報刊的資訊鋪天蓋地，我還是喜歡打開收音機，或躺或坐，閉上眼睛，聽聽新聞，欣賞音樂。

最近，我發現收不到BBC中文廣播了，試了幾個頻率，均告失敗。上網查詢原因，發現BBC已經停播中文廣播，對於一個廣播愛好者來說，現在BBC中文廣播的節目已乏善可陳，之所以去收聽，不過是一種習慣。但就這樣離去，心中還是有些捨不捨。

曾幾何時，大家可不敢公開談論BBC，因爲BBC是一個「敵台」，它們發出的總是一些「不同的聲音」。我擁有第一台收音機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，我開始讀小學，經常聽父親在晚上收聽一些海外的電台，聲音模糊而嘈雜，父親再三交代我，收音機裡講的這些東西是萬萬不可外傳的。等我上了初中，那台收音機就歸了我。每天放學回家，我會收聽音樂和評書、小說連播；到了晚上，我就躲到被窩裡，旋動按鈕，收音BBC廣播，當然還有美國之音，以及台灣的電台。對於國境之外的聲音，我有著恐懼也有那麼一絲渴望，但就是從這些「敵台」的廣播中，我也知道國境之外的許多知識，真的開闊了眼界。

站在當下，去回望那個時代的思想，也許是可笑的。但這是必須要經過的一個過程。時代總是在不

斷地進步，我們的思想中也慢慢注入了更多的全球化思維，我們有了超越意識形態之外的價值觀念。當國門大開，目不暇接的時候，世界在變化，我們在變，這些所謂的「敵台」也在變。

從受眾角度來看，廣播時代已經式微，廣播這種傳統的形式已無法滿足受眾的需求，也許除了像我這樣老聽眾，要讓「八十後」「九十後」去聽廣播，已是一件勉爲其難的事情。

再者互聯網的興起，廣播已沒有任何優勢，廣播是單向式的，是灌輸式的，這種沒有雙向溝通的傳播模式，難以在這樣多元化的社會中生存。而互聯網，要比廣播更加吸引人。

我認爲BBC中文廣播的停播最爲重要的一個原因是，BBC在國人眼中再也沒有神秘感了，現在每個人都有了自己的價值判斷，有自己獲取資訊的途徑。內地媒體對於各類新聞事件的報道幾乎是全方位的，及時而迅速。除此，微博、論壇等網絡媒體，提供了盡可能多的播報方式。在這種開放的輿論環境中，我們各種媒體中，就可以得到海量的信息。根本不必要「跑」到國外去海外廣播。

在陽光下面，社會陰暗面以及敏感的社會問題可以來說。風風雨雨評論員曹景行說，中國政府對信息的透明和開放方面，不斷進步。從這個變化中，我們看到的開放和包容，這是一種偉大的力量，其背後是一種自信，自信才敢開放。

《點心集》與山邊社

一九八〇年八月我將在《華僑日報》教育版小專欄《點心集》的文字編了一本小品集，書名就是《點心集》，自設「田田出版社」出版，由利通圖書發行，出乎意外的反應良好。到一九八一年六月已銷一萬冊，多月長踞利通暢銷書榜頭位。

當時印務公司送書來，我住四樓，沒有電梯，他們幫我搬上四樓。但到利通要書（當時不設大數量存倉），我就得把某個數量的書搬到樓下，用手推車推二十分鐘的路送去。

到何紫一九八一年創設山邊社，我就把出版工作轉交給他。那時《點心二集》也已出版，銷數同樣理想。

兩書皆由王司馬插圖，交山邊社出版時裝了彩色封面。那時我修讀圖書館學，效正邊法出版，在版權頁記載版次及印數。不過後來出的書多了，又不是自己經手版權頁，數字漸漸亂了。可靠的數字去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，第十五次印刷，連前共印五萬冊，在香港這是一個罕見的數字。《點心二集》一九八一年四月初版，到一九八八年十月第十一次印刷，連前共印三萬三千冊，亦屬不弱。《點心三集》一九八五年七月初版，到一九九一年一月第七次印刷，連前共印一萬四千冊，還算不錯吧。

杭州成功爭取聯合國把西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，值得高興，但也不需太過高興。「世界遺產名錄」之下，已有近九百遺址或景觀，國際社會不少聲音質疑，這些名銜是否太濫？過去五年，世遺名冊已增加過百名字。週遊列國，你會發現「世界遺產」到處都是。萬裡長城、雅典衛城、金字塔等遺跡，固然當之無愧；但有時納米比亞一處史前壁畫、悉尼歌劇院、秘魯山間小鎮一座小教堂，也有世遺名銜。這些「遺產」，固然有其特色，但對普通人而言，絕非那種令人驚嘆的奇景級數，祇是比一般旅遊點有意思而已。

值得高興的是，杭州西湖總算躋身遺產名錄之中，相比那些名不見經傳的「遺產」也享「世遺」大名，西湖祇屬「正名」，聊以安慰。杭州之美，名氣之大，中國無人不識，不會因世遺之名再增什麼吸引力；不過世遺名銜，必定會吸引更多外國遊客，伴隨而來，是更重的商業味道、更西方人口味的佈置。同樣情況，雲南麗江或可借鑑，麗江成爲世遺後，古城風貌大變，一切整潔明亮，納西族人遷出古城，讓路酒店食肆，麗江變成主題公園，正是名氣之累。

再者，地方政府愛不惜工本「申遺」，成功以後，有官員曾不諱言「一流景觀，要一流價錢」，入場費加價，世遺成爲搖錢樹，希望西湖不會重蹈覆轍。

世遺是什麼

青年導師孫國棟

孫國棟一九五〇年代在香港教書，編青年刊物，還寫過不少鼓勵年輕人發憤向上，追求積極人生的文章，署名孫慕稼，結集《強烈的生命》（香港華僑印書館，一九五五）。

《強烈的生命》是本三萬多字的小書，收九篇各自獨立的雜文。他在自序中說這些文章「企圖描寫與發掘的，都是一個光采而莊嚴的生命」，並以青年導師自居，覺得有責任挽救站在十字路口，不知何去何從的年輕人，希望此書能「給青年們一點精神的鼓舞」。《生死與人生》、《一顆跳動的心》、《兼愛與犧牲》、《赤裸裸的人生》和《屈原之死》五篇，透過蘇格拉底、王守仁、墨翟、莊子和屈原五位大家的所作所爲，與年輕人探求生命的意義。其餘幾篇則是透過日常生活來討論學問與人生的價值。壓卷的《強烈的生命》更強調人要有莊嚴的人生目標，發掘生命所蘊蓄的力量，以磊落的胸襟，過有血有肉的生活，達到高遠的境界。觀乎孫國棟幾十年的經歷，確實走向這條康莊大道！

孫國棟年輕時這些文章，和當年寫《段老師的眼淚》（香港中國學生週報，一九五六）時的秋實理（司馬長風）極爲相似，內容都是青年導師式的勵志文章，祇是「秋」比較柔，有文藝腔；「孫」則是思想性強，融合了乃師錢穆和唐君毅的專長，比「秋」更具積極意義。此所以他們雖是同代人，卻有不同發展。

生活在拉薩的藏族民衆，每天除了收聽收看氣象台發佈的天氣預報，還會關注一個特別的預報：西藏自治區藏醫院天文曆算所發佈的藏曆天氣預報。

和氣象台發佈的天氣預報不同，藏曆天氣預報祇預報簡單的晴、雨、陰等，但卻會發佈一系列藏族民衆特別關心的資訊，如當天的什麼時期、星宿如何、四大元素如何，甚至包括哪種藏藥可以採摘，哪種農作物可以播種，哪裡的牧場該遷移等等。

西藏天文曆算已有千年歷史，其形成與中原內地的漢曆及印度曆法有著深厚的淵源。據藏醫院天文曆算所所長英巴介紹，除了十一世紀由印度傳入拉薩的時輪曆，藏曆在唐朝時期還從中原內地引進了占卜、預測的演算法，如八卦、九宮等，「西元一七一五年左右，康熙御製漢曆大全」從蒙文翻成藏文，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，漢曆中推算日食、月食的時憲曆傳入拉薩。

一九一六年，藏醫曆算院（門孜康）成立，培養藏醫、曆算人才，並開始發行藏曆曆書。據英巴介紹，現在藏醫院天文曆算所每年出版發行的藏曆曆書數量達十餘萬冊，是除了藏文教科書以外發行量最大的藏文書，並遠銷印度、尼泊爾、不丹等國和中國青海、四川、雲南、甘肅等省的藏區。

由於沒有漢文版，藏曆曆書在內地知曉的人並不多。但二〇〇八年「5·12」汶川地震後，人們發現，其實在



藏曆：傳統的神秘曆法

當年的藏曆曆書中已經做出了相關預報。這正是由於藏曆獨特的天文曆法體系，不僅能較準確推算日、月、星辰的位置和運動，還可根據物候、星辰等現象和資料預報西藏及週邊地區天氣和地震等情況。

二〇〇八年，藏族天文曆算被納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雖然有著古老的傳承，但有著千年歷史的藏曆演算也煥發出新時代的生機。從一九九二年開始，英巴著手開發一套名爲《西藏天文曆算數據運算系統》的軟體。在他的演示中，祇用在軟體的計算系統裡輸入年月日，瞬間即可得出相應資料，「以前需要人工手動好幾個月的推算，現在自動滑鼠就可以完成」。

對於近年來自然災害頻密的問題，在筆者的追問中，英巴所長稱今年下半年「沒有大的問題」。至於二〇一二年的藏曆曆書也已推算完畢，目前正在校對中，預計十月出版。

何紫的兒童小說

第二個特色是教育性極強，幾乎每一篇都可用作學校德育教材。何紫卻不說教，而是通過動人的故事讓讀者分辨是非善惡。

第三是何紫的幽默感，他本身胖胖的又愛笑，活脫脫喜劇人物，他的小說感人能使人哭，幽默又能使人笑。

第四是故事中那份童真，祇有真正有童心的人才寫得出，那一個個帶稚氣的細節，使讀者莞爾而笑。難怪他還有一個筆名叫「稚心」。我讀了這批小說後在報上爲文推薦，再版時他竟放在書前，當時我們還未認識。後來他又出《兒童小說新集》，同樣精彩。

富豪社交網絡

「國際商業機器」（IBM）本月慶祝其前身：「運算表記錄公司」（Computing Tabulating Recording Corp.，簡稱CTR）正式登記註冊一百週年，令人不禁想起科技界如何長江後浪推前浪：IBM捧紅了微軟，之後互聯網崛起則出了谷歌，然而谷歌之後又有「臉書」，現在乃是Twitter叱吒一時。

Twitter最厲害的地方，是和金融業界產生的奇妙關係——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最近對比了Twitter留言內容中的「情緒字詞」跟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」之關係，研究的目標，是一班學者直覺地以爲：股市下挫，即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大跌數天後，Twitter留言中便會增加大量「負面情緒字詞」，反映股民心緒。相反，當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上揚後的天數，Twitter內當多了「快樂留言」。但研究結果卻不是如此——學者每天分析的一億條Twitter留言所使用的「情緒字詞」，發現在百分之八十七的準確程度下，Twitter留言中的正面及反面「情緒字詞」，竟分別於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的上漲和下跌趨勢之三四天前出現；也就是說，Twitter留言的情緒字詞，有極準確預測市況之功能！有英國基金公司看準了這個機會，更以此開設了一個「Twitter對沖基金」！

事實上，世界各地的確多了富豪對利用社交網絡賺錢感興趣：皆因金融海嘯之後，不少有錢人都覺得被銀行家欺騙，是故寧可詢問別的有錢人之投資意見。像一個名爲「蜂巢家庭網」（Family Bhive）的社交網絡，便標榜自己是「富豪臉書」，用戶要先證明自己已有五百萬英鎊資產，才可成爲會員；且網站還會按資產來把會員分級，五百萬至二千萬鎊是最低級別，中級是二千萬至一億鎊資產者，一億鎊資產以上是爲最高級，讓富豪們各交換心得，竟然也吸引了不少會員。

此外，還有「π資金」社交網絡，專供創業家交換投資意見，年費高達港幣五萬，平均每人的投資額達二億港元！

別創一格的南瓜壺



江蘇宜興紫砂壺吸引人之處，除了其泡茶優點與實用性（質密無吸水性，保味但不奪茶香，無熱湯氣而不失茶味），名家精製者之造型、色調、手藝，以至其風格神韻和創意，皆引人入勝。光是造型及壺色方面，已千變萬化。所謂「方非一式，圓不一相，文豈傳形，賦難爲狀」。自明代正德、萬曆以來，不論屬幾何形、自然形、筋紋形，抑或微型，多以造化爲師，但獨有韻致趣味。

現今有些名家，一方面繼承紫砂壺這種設計與製作精神，一方面另闢蹊徑，善加衍化，別創一格。例如附圖爲近代名家王小龍創製的特色南瓜型紫砂茶壺。他除了調配出白沙泥般的色調外，就是造型上一反傳統；其瓜蒂並非作壺蓋位於上方，而是在壺身側面，瓜蒂則連藤作壺把，藤卻連瓜葉作壺蓋。

十七世紀上半葉，陳子畦（陳鳴遠之父）曾創製一把十分特別的自然形南瓜壺，以瓜柄爲壺蓋，以「蛙瓜葉捲成壺把，以瓜藤爲壺把，造型富想像力與藝術美，可說匠心獨運，巧奪天工。」今夏的第一次三號風球叫海馬。來了兩天，並不猛烈，兜過一圈後就走了。說到颱風的名字，我還是喜歡以前的——用風姐來命名，有點浪漫，也有點像空想，儘管打風不見得是浪漫的事。吃了晚飯，我們的「功課」是散步維園。推窗看大街，好像沒有什麼雨，於是照平常計劃前往。經過風雨掃蕩，這維園滿地落葉和落花。颱風在高樓大廈沒有留下什麼痕跡，倒是在這裡遍地落葉，難得有幾分蕭索的味道。想起一些名詩名句——「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。」「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。」「高閣客去去，小園花亂飛。」「風雨誘花殘，香雪繽紛落滿園。春去留不住，歲月如花隨風轉，青絲難再兩鬢斑。」「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，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。」「風雨故人來。」「滿目山河空念遠，落花風雨更傷春，不如憐取眼前人。」中國文化傳統，古典詩詞真是巨大寶藏。眼前的景色，時刻都可代入詩詞名句之中。這些名詩名句，幾行詩，已經勝過千言萬語，精彩萬分。觸景生情，生出來的是中國文壇千古佳話。某天，一位朋友說，他已經沒有中國的感情，祇有世界公民的感情，我說我不能相信！